

邱汉生 著

四書原注簡論



四书集注简论

邱汉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书集注简论

邱汉生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 1/2印张 102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300册

统一书号：11190·050 定价：0.76元

目 录

前 论	(1)
-----------	-------

一、学、庸、语、孟,四书并行	(2)
----------------------	-------

(一)贬孟与尊孟论争的理学总结	
-----------------	--

——《读余隐之尊孟辩》.....	(2)
------------------	-------

(二)尊崇《大学》,奉为“初学入德之门”	
----------------------	--

《大学》的多种不同本子.....	(7)
------------------	-------

(三)尊崇《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	(10)
---------------------------	--------

(四)“四子,六经之阶梯”,树立《四书》在初学教育的统治地位.....	(18)
-------------------------------------	--------

二、《四书集注》的编著	(21)
-------------------	--------

(一)用毕生精力编著《四书集注》,把它纳入理学的轨道.....	(21)
---------------------------------	--------

(二)经过“四十余年理会”的《论语集注》 (编著一例).....	(26)
-------------------------------------	--------

(三)对《四书集注》的自我标榜,“添一字不得, 减一字不得”	(32)
---	--------

本论一(36)

一、天理论(38)

(一)所谓“天理”.....(38)

(二)天理与封建道德、封建礼乐刑政.....(42)

(三)关于“理一分殊”.....(46)

(四)关于“化育流行”.....(52)

(五)“理”与“天”.....(59)

二、性论(63)

(一)人性与物性.....(63)

(二)“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66)

(三)习染 天理与人欲的对立.....(72)

(四)心、性、情、欲与天命.....(77)

三、格物致知论.....(80)

(一)所谓“物”与“心”.....(81)

(二)“即物穷理”与“致吾之知”.....(88)

(三)关于“一旦豁然贯通”.....(92)

(四)感觉与思维 知与行.....(94)

本论二(99)

一、政治论(99)

(一)反动统治阶级的“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99)

(二)封建主义的“耕织图”·····	(101)
(三)镇压与欺骗两手 “教民”实质是愚民·····	(104)
二、教育论·····	(109)
(一)“学以明伦”的教育目的·····	(109)
(二)成人 圣人之德与贤人之学·····	(111)
(三)所谓“圣贤气象”·····	(113)
(四)关于“下学上达”·····	(115)
(五)学习的方式：自修与讲习·····	(118)
(六)教学方法·····	(121)
三、道统论·····	(124)
(一)道统与道学·····	(124)
(二)对待“异端”的严与恕·····	(128)
本论三·····	(132)
一、所谓“万理归于一理”·····	(133)
二、人身与心性 佛性与根性·····	(142)
三、关于“净染”·····	(148)
四、朱熹认识论的华严宗印迹·····	(156)
附论一·····	(161)
一、《四书集注》的学风旨趣·····	(161)

二、《四书集注》产生的历史条件	(164)
附论二	(168)
一、《四书性理字义》反映的宇宙论性论认识论	(168)
二、隶首不能算其数的四书类著作	(193)
附论三	(196)
一、《四书集注》的后世影响	(196)
二、鲁迅对理学家的鞭挞	(197)
后 记	(200)

前 论

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宋朝以后影响最深最广的一部“经书”，统治了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界达七百年之久，流毒至今未已。

元朝廷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从此，《四书集注》成为必读的“经书”。书塾里不但要背诵《四书》正文，也要背诵一部分朱熹的注释。科举考试要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作为立论根据。八股文的所谓“代圣贤立言”，实际是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阐述的理学思想在八股文中敷衍一番而已。毛泽东同志指出，“那时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毛泽东同志把这些称为“老八股、老教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8页）毛泽东同志揭露和批判的那种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七百年间，就是如此。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统治阶级用以教学生的“孔夫子的道理”，统治阶级“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的“孔夫子的一

套”，实质就是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阐述的理学思想。

清朝进步思想家戴震说：理学家“以理杀人”。朱熹就在《四书集注》里，用“生花”之笔，巧妙地“以理杀人”。五四运动时期，反对过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9页）为了肃清封建主义的流毒，对朱熹这部程朱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应该清理，应该总结。

一、学、庸、语、孟，四书并行

（一）贬孟与尊孟论争的理学总结

——《读余隐之尊孟辩》

封建社会后期，阶级斗争发展到新的阶段。北宋方腊起义，提出“天下国家，本同一理”，指斥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是“安有此理”，鲜明地指出地主和农民两个对立阶级各有不同的“理”。两宋之际，钟相、杨么起义，诛杀封建官吏和地主。凡参加起义的，一律免除赋税徭役，不受宋朝政府的法律束缚。

起义军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概括了农民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均分财富的愿望。洞庭湖周围，“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扼杀农民起义提出来的革命的“理”或“天理”，就提出了地主阶级的所谓“天理”。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阐述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程朱理学的“经书”。（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均后于二程，但农民的革命的“理”，在方腊起义以前早就存在。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早于二程的生年约三十年。方腊吃菜事魔，又奉东汉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为祖。张角信奉《太平经》，宣传“天生人，幸使人人有筋力，可以自衣食”的革命思想，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掠夺。）

面对农民的革命的“理”或“天理”，统治阶级急忙扩大“经书”的注释范围，并重新注释“经书”，着重宣传“天理”。

唐朝的官修“经书”注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北宋初年，《五经正义》仍然是官定的“经书”注疏。但是，北宋政府又派人校定了《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正义，重定了《孝经》《论语》《尔雅》三疏，官定经注的范围逐步扩大。

学者又开始重新作“经书”的注释。官定经注范围的扩大和“经书”的重新注释，是封建统治阶级补充和加强思想统治的一种文化政策。程朱抬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为一套“经书”，并为之作注，使之与《五经》并列，是封建统治阶级扩大经注范围，并重新注释“经书”，补充和加强思想统治的重大事件。从此，《四书》《五经》的名称就流行起来，《四书》甚至代替了《五经》在封建教育领域的统治地位，《五经》可以不读，而《四书》则非读不可。

《四书》原来是不并行的。以《论语》《孟子》为例，《论语》是经，而《孟子》是子。《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列《论语》于六艺略，而列《孟子》于诸子略。赵岐《孟子题辞》说，汉文帝时“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这是传记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那时候，《论语》《孟子》不算《经》。西汉中期以后，帝师张禹传习《论语》。《论语》的地位显赫起来。但是《孟子》还是子书。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列《孟子》于子部，与经地位悬殊。宋儒一反历代对《孟子》传统看法，把它超“子”入“经”。这不是对一部书的地位的偶然变动，而是出于政治上扩大“经书”范围以及重新注释“经书”的需要。

韩愈的道统说，认为“道”就是仁义道德等“先王之教”，从尧、舜以来一直传到孔、孟。孟子是道统的最后一人。“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这是明显地尊孟的开始。

宋朝，《孟子》列入《九经》。就在《孟子》超“子”入“经”的时候，思想学术领域发生了贬孟与尊孟的论争。这个论争，在两宋之际延续了一百年，直到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才告结束。从此，孟子的地位抬高了。

北宋进步思想家李觏著《常语》，首先批判孟子。李觏指斥孟子以仁义“乱天下”，其仁义之说，与纵横家的欺骗，兵家的诈诡，来源虽然不一样，而“乱天下”的结果是一致的。（《常语》：“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孟子是“五霸之罪人”。（《常语》：“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李觏还指出孟子所说关于舜与瞽叟、象的传说，是无稽的“委巷之说”；韩愈道统说所谓圣人之道由“孔子传之孟轲”也不符合事实。

另一个学者郑厚叔（叔友）著《艺圃折中》，指出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么“贤人”，乃是“忍人”、“辩士”，资性轻薄。孟子口口声声“诵仁义”，乃是“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要索高价，想做大官，玩

的是一套“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孟子同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辩论，每次都“困而遁，遁而支离”，“沮气赧颜”，理屈辞穷。

司马光著《疑孟》，指出孟子做官，是“为礼貌而仕”，“为饮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与郑厚叔议论相似，又冯休作《删孟子》，晁说之作《诋孟》，皆以排诋孟子为事，与司马光《疑孟》、李觏《常语》相似。

有贬孟也就有尊孟，论争很激烈。二程继韩愈之后，竭力尊孟。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二程以后，余允文（余隐之）写了《尊孟辩》，逐条反驳李觏、郑叔友等的贬孟之说，为孟子辩护。朱熹则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肯定并补充余允文之说，进一步尊崇孟子。朱熹谓孟子“出处大概”，高不可及。“《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没有这个运舟之人，舟就无可航行。朱熹认为李觏“不足以窥孟子之藩篱”，而好为议论，以“功利之浅”，诋毁孟子的“仁义”之道，是“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朱熹认为郑叔友的议论是“诡僻颠倒”，“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

贬孟与尊孟的论争，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绵历一百年之久。这反映了在农民起义指斥封建统治阶级“安有此理”的时刻，统治阶级图谋修补统治思想、寻找思想武器的惶急情状，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学术思想的分歧。朱熹以理学家的身分写的《读余隐之尊孟辩》为这场论争作了总结，其结论是必须尊孟，应该尊孟。从此，孟子的地位抬高了，即使明太祖以皇帝之尊，删改《孟子》，也不能改变孟子已被尊崇的地位。

（二）尊崇《大学》，奉为“初学入德之门” 《大学》的多种不同本子

《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韩愈、李翱等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二程、朱熹祖述这种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二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则说：《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曾参“作为传义，发明其意。孟子死后，而其传泯焉”，“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宋朝“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

章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粲然复明于世”。朱熹又说，《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底规模”。好像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却以他书填补去”。又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以下简称《语类》。）照朱熹看来，《大学》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容纳的“纲领”或“间架”，“他书”“他经”都可以“填补”进去，都可以“杂说在里许”。这种说法是十分新奇的，在过去是没有人这样讲过的。朱熹所以要这样尊崇《大学》，目的就在用《大学》里的说教，填补封建统治思想的缺漏。

二程朱熹重新编定了《大学》的章次。朱熹在《记〈大学〉后》一文中说，《大学》“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次，子程子盖尝正之。”朱熹又因二程遗说，“复定此本。”其中有些章从程本，有些章从旧本，有些章则朱熹自定，既不从程，又不从旧。特别是格物致知章是朱熹补写的，不是《大学》原文。朱熹说，“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这段所谓“补传”共一百三十四字，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精髓，由朱熹依照自己的见解撰作，

强行补进《大学》的，而名义上则托之“取程子之意”。朱熹说，“传之一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以上并从程本，而增诗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释本末，五章释致知，并今本。六章释诚意，七章释正心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旧本。”朱熹自以为这样定了章句，就“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了。二程定章句于前，朱熹又定章句于后，把《大学》的原来次序改变了。不经考订，妄改古书，使之服从于自己学术的要求，这是宋人的一种横蛮的学风。

《二程全书·程氏经说》卷第五，有程颢的《改正大学》，又有程颐的《改正大学》。两兄弟各改各的，彼此不同。而朱熹的《大学章句》，则既不同于程颢，又不同于程颐。后来，明朝的王守仁又抬出古本《大学》，显然是要在程朱以外，另辟蹊径。清人毛奇龄撰《大学证文》，考《大学》传本，有注疏本（即古本），程颢改本，程颐改本，朱熹改本，王柏改本，季本改本，高攀龙改本，葛寅亮改本，等等。（又丰坊依托的魏正始石经本，汉熹平石经本，即古注疏本，都未举。）移掇经文，颠倒次序，各逞私意，乃至如是。清胡渭作《大学翼真》，亦不能免此。《大学》一书，遭遇如此，在古书里实为罕见。《大学》的作者已逝，对其章次、内容，不复能有所辩

白，就一任后人去摆布吧。“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于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此诚“慨乎言之”矣。

（三）尊崇《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

二程继韩愈、李翱之后，尊崇《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这个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可见二程是从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和世界观的核心“理”的高度来评价《中庸》的。二程认为，《中庸》的基本内容讲的是“理”，世间万事万物都包摄在这“一理”之中，六合的广大，道心的精深微密，无非体现着这个永恒不变的“一理”。二程把《中庸》看成“孔门传授心法”，即用佛教的师徒之间神秘传法来相比拟。所谓“传授心法”，实际就是韩愈所说“道统”的承传。朱熹对此，有毫不讳饰的表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上古尧舜等“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朱熹不仅打出“道统”的旗号，而且公开打出“道学”的旗号，还提出孔子在“道统”中的地位是“继往圣，开来